



一张有关段家坝机场的旧照

◎羌松延



1946年5月16日《五山日报》报道周恩来、马歇尔等将飞南通的消息。

今年8月24日是兴东机场通航三十周年的日子。回顾南通的航空发展史,位于城南的原南通县飞行场(百姓惯称段家坝机场或城南机场)广为人知。笔者在搜集资料撰写《南通历史上最早的机场》(刊于《江海晚报》2021年6月9日)时,曾有幸得见一张拍摄于该机场的合影,或为现存与南通地区机场有关的最早影像,颇为珍贵。

该照刊登于《通报》1946年9月4日第3版,左标“前执行小组在通机场留影”字样,并注明摄影者为记者蔡光之。遗憾的是,因当年印刷条件与新闻纸质量所限,照片的清晰度不高。

图中所提执行小组,全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执行小组。抗战胜利后,随着国共双方签订《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》(即《双十协定》)后出现的新情况,“军事三人小组”应运而生,在北平成立了由国民政府代表、中共代表及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。后因国民党军队在扬中、南通等地渡江上岸,侵占华中解放区的泰兴、靖江和南通的平潮等城镇,华中军民要求徐州执行小组对停战事宜进行商讨。因调处没有结果,军事冲突便愈演愈烈。1946年3月初,“三人委员会”成员周恩来、张治中、马歇尔到徐州调处,并专门在徐州中心小组下增设了淮阴第十七执行小组。淮阴小组的三方代表为中共代表韩念龙上校、国民政府代表肖凤岐上校、美方代表邓克中校,办公地点设在位于淮阴的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。



执行小组在南通机场合影。

淮阴执行小组一行于3月12日起赴苏中前线视察,辗转于东台、如皋、南通等地。3月18日,南通青年学生在欢迎会后冒雨游行,涌向执行小组下榻的桃之华旅馆请愿。国民党对此恼羞成怒,暗杀了参加要求和平民主集会游行的8名青年,制造了震惊全国的“南通惨案”。

综合沪通等地多家报纸报道,淮阴执行小组专机曾数次在段家坝机场起降。1946年4月底,小海、观音山战斗发生后,因“南通方面情势紧张”,淮阴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邓克中校率国民党代表杨超上校、中共代表蒋克定中校及美方白来特·赫司脱中校,于5月10日下午乘专机抵通,随行有翻译官孙文荣、电台台长沈万程、译电员朱玉崑等人。此后虽有6月23日“美上校屈门汉昨由(北)平飞(南)通”、7月20日美方代表赫司脱中校“昨晨乘飞机飞往泰县、泰兴视察,……下午仍乘原机返通”等报道,但直至执行小组撤离,几乎不见中共代表参与调处,更无三方人员同时乘机的消息。由此推断,该照片记录的似为执行小组三方人员于5月10日抵达段家坝机场后的镜头。

内战全面爆发后,国民党军队于7月13日向苏中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。淮阴执行小组随即移设南通,更名为南通中心小组,也称南通执行小组。后因调处活动失败,南通中心小组于1947年2月“离通飞平”。

其实,这张照片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。自小海、观音

山战斗之后,各媒体争相报道,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。但随之而来的是“共军五万正图进攻南通”的传言甚嚣尘上。于是,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徐永昌、中共代表周恩来及美方代表马歇尔即“拟乘飞机前往调查”,周恩来也曾公开表示愿为此事前往南通。

5月16日一大早,通城南门外的长桥揭示处就贴出了一张由新通、五山两报联合公布的特闻,红纸上用毛笔书写的大字,“公布着马歇尔元帅与政府代表徐永昌将军,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氏,三位将于今晨八时飞通的消息。这条新闻的发布,骚动了整个通城,在七点多钟的时候,各学校的师生,各团体机关的首长以及代表,都陆续向城南郊外的飞机场出发,准备欢迎这三位和平使者的莅临。”在飞机飘下纸条告知次日抵达及本地媒体报道“今则马帅亲偕徐、周两先生同莅吾通”后,人们再次于17日涌向城南机场,包括一〇五师师长兼新任南通守备司令刘汉玉、国民党南通区专员兼南通守备副司令徐嘉谟等机关首长也陆续前往。一万余人守候于此,皆欲一睹几位的风采,但饥肠辘辘的结果却是“两度望机空欢喜”。

原来,周恩来等人在出发前得到业已返回北平的淮阴小组的报告:“自本月(按:即5月)初以来,该处一切安谧”,即“共军进攻南通(消息)不确”。于是,周恩来、马歇尔等三人小组的南通之行遂因此而作罢。

小镇食品站

◎程太和

老家所在地的丁所食品站位于栟茶河南岸,坐东朝西,对面是兽医站,斜对面是建筑站,食品站的河对岸是农具厂,两岸以一座大木桥相连接。

小镇食品站,是仅次于供销社热闹的地方。过去,庄户人家户户养猪,养了猪就要到食品站出售。食品站给人的印象就是收猪的、杀猪的、卖肉的,其实,食品站还从事活禽和蛋类等副食品收购,还有家禽孵化作坊(哺坊)。在计划经济年代,食品站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作出了贡献。

当然,食品站的主营业务是生猪。说到生猪,首先得从养猪说起。数十年前,一头苗猪从市场上买回来,到养成大肥猪,差不多要花10个月的时间。养猪的目的,一是积肥,二是卖钱。过去养猪,没有现在的配合饲料,充其量也就是一些玉米、大麦、麸皮、稻糠之类的细料,佐以山芋藤、瓜藤、某些植物的茎叶、野猪草等。人们朝饲暮喂的目标,就是养成一只大肥猪,换到几十块钱钞票。生猪生性懒惰,也只有懒惰,才能养得膘肥体壮。待猪长到120斤以上时,就可到食品站出售了。

食品站的司秤员是个很吃香的职业,嘴里叼着烟,耳朵上也夹着烟,烟灰不停地往下掉。出售生猪,首先要过司秤员的评级关。大肥猪分成六个等级,六等最差,一等最好。在农民口粮都成问题的年代,生猪的饲料更成问题,生猪的等级自然高不到哪儿去,一般有个四等、五等就差不多了,六等也是正常的事,只要司秤员不拒绝收购就谢天谢地了。一个六等的120多斤重的生猪,大体上能卖到50元钱。司秤员给猪定等级,也就是看看猪仔的“卖相”,用手按按猪脊背,托托猪肚皮,然后说出个等级。定下等级后,用一把长长的剪刀在猪背上剪出“码子”。这一系列的过程,卖猪者总是赔着笑脸,不停地递烟。

食品站的屠宰工,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杀猪匠,是个辛苦的职业,每天凌晨3点多钟就起床,做好屠宰前的准备工作,然后把趴在地上的大肥猪一个抓尾巴,一个提耳朵,按躺在案板上,“点红”放血屠宰。参与屠宰的其他人员也要在天明前起来,把已杀白了的猪胴和内脏等过秤记录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食品站每天要杀20多头猪,其中,10多头供应乡村代销网店销售,10多头供应食品站门市销售。猪肉价格一般维持在每斤0.74元,夏季有时价格有所降低。食品站每天收购的猪远远多于本站屠宰的猪,据说大部分生猪都被运到如皋、泰州的肉联厂屠宰了。70年代末80年代初,海安食品公司办起了肉制品加工厂,后来改叫肉联厂,乡镇食品站收购的生猪就在海安本地屠宰了。

80年代中期后,生猪购销价逐步放开,猪肉零售价随市场销售情况而变动。原先由国营食品部门垄断购销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,乡镇食品站的那些老地盘也都改制出售了。

汤浣香喜海珊两医的常用药

◎蔡观明



汤浣香的医道,以大刀阔斧著称。生平好用豆豉,用豆豉一定要用五钱。曾有通州师范某生,因感冒请他诊治,方中不用说有豆豉五钱。某生疑分量太重,只服了三钱,也就一汗而愈。可见五钱没有必要,而过汗伤阴的流弊更在所难免。

喜海珊晚年吃素,道家装束,不

出诊。每天门诊总有几十号,尤以妇女为多。妇人病多半是家庭气恼,肝气不舒。喜海珊和颜悦色地和她们谈家常,极力安慰劝解,先在心理方面下了功夫。然后开方,总不外乎平肝顺气极其平淡之品,而且多是他的儿子在旁听他和病人闲谈时就写好的。喜海珊也取去看一下,从

来不会改动。每一个方子的引子,多半是金橘叶七片。吃过这方子的绝大多数药到病除,喜先生名气更大了。可是有人仿用他的金橘叶七片,也曾出过毛病。因为阴虚肝旺的人吃了金橘叶,也感到太温燥。由此可见,喜海珊用金橘叶,自有斟酌,不是一概乱用,所以不出毛病。